



第一章 政治智慧

周恩来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他少小立志为救国救民而发奋读书，为遍寻真理而渡洋蹈海。当他找到了马列，一经确立信仰之后，便终身而为此奋斗，从此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宗旨和信条。在布满荆棘、充满坎坷的征途中，他始终为这一崇高的目标奋斗不息，没有丝毫动摇过。为了党、国家和人民，他可以履艰涉难而不折，忍辱负重而不悔。他所采取的一切方略，都紧紧围绕着这一目标恪守着这一宗旨，这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动力和行动准则。

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立志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只有志存高远，才能让人砺志不息。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便有了方向，奋斗才有了目标。周恩来在他的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宏伟的志向，这就是伟人的成功之始。

白山黑水的关东大地，曾留下了一代伟人少年求学的足迹。“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稚嫩童声，道出了少年周恩来不凡的志向，也从此开始了他寻求救国之路的起点。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同回淮安探亲的三伯父周贻谦来到东北读书。这在周恩来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恩来后来曾回忆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焦点的东北，给少年的周恩来带来了异常强烈的刺激。正是在这里，激发了他爱国主义的热情。周恩来到东北后，先在铁岭县银州镇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然后转入奉天（即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该校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是1910年春“废科举，兴学校”的潮流中兴办起来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除教一些经书外，能常给学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等十数门。这些课程给少年的周恩来

展现了一个新天地。他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

据记载，他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有一位叫高戈吾的历史老师，常给同学们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痛陈国家弱小被众列强所欺辱的时局，鼓吹反清革命，把章太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以及时事报刊介绍给他们阅读，还特别把邹容所著的《革命军》小册子借给了周恩来。还有一位姓毛的地理老师，倾向于康梁的维新思想，也常常向周恩来介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书籍。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周恩来开始关心国事并从此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报纸书刊中，他了解到有关民族危机、清朝腐朽和人民苦难的许多事情，也了解到了一些像邹容那样的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也从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和进取精神。他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危急的时局以及如何救国和宣传救亡的问题，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消息传到学校后，他就立即剪去了辫子，以表示对清王朝的决裂。

暑假中，他随一位同学到了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这位同学的爷爷，是一位在乡里教私塾的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老人，领着他们目睹了当年日俄战争的旧战场。老人由于心情异常激愤，手捋银髯，仰天长叹，为他们吟咏了这样的诗句：

“登彼龙山兮山巅，
望彼河水兮潺潺。
忆甲辰年兮神往，
想日俄战兮心酸。”

“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
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
今吾老兮有何志愿？
图自强兮在尔少年！”

这一切都无不激励着少年的周恩来，要为救国纾难而发愤读书。不象别的孩子，此时的周恩来就似乎已确实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以及怎样去读书。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已表现出高尚的志向、浓烈的爱国情感和引人注目的才能。有一次，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当时兼为修身课的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当时，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个人的前途而读书”，还有的回答是“为家父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时，他的回答却语惊四座：“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后大为震动，一个孩子能有这等抱负、这等气魄，真是难得啊。他禁不住连声称赞道：“好啊！好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同学们，有志者当效周生。”

从此时开始，周恩来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就一直像一团烈火一样燃烧在他的心中，成为他经久持续的动力，激励着他更加努力学习，不断进行探索。“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学生时代的主旋律。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与他在少年时代的立志是否崇高远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伟大事业，其基础就建立在少年时代的

远大志向上。他其后在南开读书时，还写有一篇《尚志论》的作文，文中有言：“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并例举有志者当效“探新大陆的哥伦布”、“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昆”、“击楫中流之祖逖”。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立下的就是公而忘私，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1912年10月，周恩来写了一篇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就明显表达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文章的中心就是：中国要图富强，就应该从根本做起，把教育办好。他在文中写道：

“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

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

这篇《感言》，立意新颖，言简意赅，论说精辟，语重心长，字里行间充满着远大的志向和爱国的激情。国文老师阅后，大喜过望，倍受鼓舞，他在文末批写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此文不久被奉天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作为甲等作文展出，并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后来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数据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二书也先后收录了这篇作文。

1917年，周恩来于南开学校毕业后，准备赴日本留学，他特地从天津回沈阳母校与那里的师生告别，临别时他给一位同学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这位同学一直把这个题字保存了四十余年，直到1957年还给了时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两个老同学终于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重逢相会，正如题字所言，挣脱了重重枷锁的中华巨龙开始昂首腾飞了。

二、“面壁十年图破壁”

立志有恒，方能匡时救世。达摩十年面壁，苦苦修炼，破壁之日终成就一代高僧。周恩来的“面壁十年图破壁”，就是要求自己像达摩那样面壁苦学，求得“济世”的本领。自强不息的努力，这就是周恩来成功的基本条件。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因伯父周贻赓的工作变动，离

开了沈阳奔赴天津，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天津是华北的大商埠，西卫北京，东扼渤海，它的地理位置使得近代以来各国列强对之垂涎三尺，也就成为了较早开放的门户。在天津近代工业兴起较早，新式教育也居于比较先进的地位。南开中学是一所四年制的学校，是完全是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校长张伯苓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南开校风以“严肃、庄重”而著称。学生一进校门，就有一面大镜子悬与左侧，以供端正仪容之用。镜上还铭刻有醒目的“诤诫之言”：

面必净 发必理 衣必整 钮必扣
 头容正 肩容平 胸容宽 背容直
 气象： 勿 傲 勿 暴 勿 怠
 颜色： 宜 和 宜 静 宜 庄

周恩来之一生风度翩翩，仪表不凡，彬彬有礼，庄重大方，性格和蔼，平易近人，就是在南开养成的好习惯。他从1913年8月入学，到1917年6月毕业，在南开学习了整整四年时间。对南开周恩来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每次来至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便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周恩来在南开求学的四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处境正日渐恶化，清王朝完结之后，政府仍是每况愈下，混乱在中国蔓延，外强的威胁日趋严重。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和对国情的加深了解，他的忧国忧民心情更加激烈了。当时周恩来所写的一首政治评论诗，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

“ 茫茫大地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

在他这个时期的作文中，也随处可见这类悲愤的心声。他说，“ 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 他目睹时艰，忧国忧民，由爱国心切，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他对个各门功课精进钻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记载他在南开期间，“ 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其茅。”

中学即将毕业，他把自己个人的前途与救国的道路联系在一起反复思虑，终下定决心要出洋留学。因为只有到外国，才能真正学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半个世纪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都是面向西方的。周恩来想到美国去，可他家境贫寒，无力成行，他的美国留学梦破灭了。此时，周恩来的一位名叫吴达阁的好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愿借给他一笔路费，帮助他到日本留学。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强大起来，且日本的国情又与中国极为相似，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又能进行现代化和工业化改革的国家，所以许多有识之士都想来此取经，找到一条救国的终南捷径。对周恩来而言，除了有类似想法之外，就是考虑到中日之间相距很近，只需较少的路费。另外，当时中日两国还有一个协定规定，

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日本政府指定的日本大专院校之一的，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回国为止。若能得到官费留学的待遇，求学的费用就能解决了。因此，周恩来把留学的目标转向了日本，决定去扶桑求学。

在离国之前，他凭窗遥望，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俯案写下了这样一首表示自己决心的诗句：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年的秋天，19岁的周恩来穿过鸭绿江，从朝鲜的釜山登船，蹈过滔滔的东海，来到了日本。准备刻苦地“面壁”求学，以求一旦学成“济世”的“群科”，将来“破壁”而飞，去改造今日的社会。

在留学日本期间，周恩来还恭敬地抄录了梁启超的（自励）一诗赠以同在日本留学的王朴山，也借此予以自励。诗曰：

“献身甘作千矢的，
著述求为万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
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
举国有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
海天寥廓立多时。”

但在日本的求学道路却是十分地艰难，周恩来在南开学

的是英文，全无一点日文基础，随着考期的越来越远，同时家里的境况又每况愈下，不久又接到了八伯父去世的消息，一行家书一行泪，使他忧心如焚，心中不知是悲是痛，似乎全都失去了知觉。他报考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又落选了，官费留学的希望也落空了。这一切对周恩来的打击太大了，落第的苦闷无奈，游子的思乡愁情，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一度曾考虑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主义”来为自己解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但这些并没有把周恩来压垮，他告诫自己要经得起挫折，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比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也多亏了他从国内带来的许多《新青年》杂志，他早起晚归都与（新青年）为伴，使他消散几个月来胸中的愁云。他说，“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他把家庭和个

人的悲剧与国家和社会的不幸联系在一起，便使他从个人的悲痛以及对家庭的思念中解脱出来，精神为之一振。在农历戊午年的春节伊始，他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要做现在罪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种新的信念使他从极端的苦闷和烦恼中得到了解脱，在他眼前产生了一片新的希望，并使他从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但什么是最新的思想、最新的事情和最新的学问，他一时仍是模糊不清的。他一面集中精力准备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一面又去寻求探索新的思想和新的学问。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大量地读书看报，十分关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对日本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等新思潮都特别有兴趣。这一时期，周恩来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那里，开始领略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成为了河上肇创办的双周刊杂志《社会经济问题》的热心读者，并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应该说，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敲”，最后确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他在日本入了马克思主义之门的。

此时，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打断了周恩来对新思想的探索。段祺瑞北洋政府要出卖主权，与日本联合出兵苏联，准备秘密签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事情泄露后，激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促使他投身到爱国斗争中去，并成为了留日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的领袖之一。

1919年春，周恩来准备回国投身于祖国正在开始的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斗争。清明时节，阴雨绵绵，樱花初开，他冒雨游览了京都的岚山、圆山等地。在他留下的几篇诗句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情感的倾注。我们仅摘录其《雨中岚山》一诗，亦可窥其一斑：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在诗中，我们不难领略到此时的周恩来，似乎已经隐约找到了“济世”的真理，“一线阳光穿云出”，“模糊中偶然见一点光明”，不就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吗？俄国人革命成功了，中国人不也可以这样做吗？千寻万找，终于见到了，能不高兴吗？真是“愈见姣妍”，“愈觉姣妍”。

三、“革心”与“革新”

1919年春，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这时，正是“五四”的前夕。不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人民长期以

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卖国罪行的愤怒郁积已久的大爆发。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爆发，站在这场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各地学校的学生们。周恩来作为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青年学生，爱国的强烈责任感促使他立即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洪流之中。后来，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起五四时期的革命经历时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受旧教育，后来因为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了革命。”

“五四运动”起于北京，很快就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5月7日，天津各校学生首起响应，举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23日，15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群众发动的程度，天津也较其他地区广泛。25日，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在两会的组织领导下，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天津的社会各界在此带动下，也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并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各界联合会。6月27日，派出了马骏、刘清扬等十名代表赴北京参加在总统府的请愿运动。由于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使得后来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周恩来一回到天津，就回到南开母校，积极地投入到学生的爱国运动中。由于他一贯的爱国思想，既能说又善写，再加上他杰出的组织才能以及对社会活动的热心，使他享有极高的威信，很快就被推举参与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请他主办会报，他表示愉快接受，他

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学生会报，我愿大家共同努力。”7月21日，他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他宣布，这张报纸要“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与‘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何为“革心”与“革新”，就是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入手去改造社会。

“思想改造”与“社会改造”并举命题的提出，对我党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无独有偶，稍后不久，北京的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提出了这一命题。他说，“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改造人类精神，必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主张物心两方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是在1919年9月。第二年，湖南的毛泽东在创立新民学会时也提出了个人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道，“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几位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在此时提出了改造思想的命题，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先进青年的一种心声，那就是他们从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入手去改造客观世界以实现反帝反封建伟大目标的决心。

为进一步推进爱国学生运动，周恩来发起组织觉悟社，作为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以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成立。觉悟社集中了天津优秀青年的代表，参加者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人。周恩来被推举为主席。大家一致通过了周恩来为觉悟社拟订的方案。这就是：“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取共同研究的态

度，发表一切主张；对于社会一切生活取评论态度；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出版社刊《觉悟》，在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觉悟的宣言》，又进一步提出了觉悟的目标——“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

觉悟社的社员采用抽签的办法，抽取每人的号码，再利用此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周恩来抽的是五号，这就是他别名“伍豪”的由来。

周恩来除了用巨大的精力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期刊作为指导运动、宣传群众的喉舌和阵地外，他还积极参加其他领导活动，从事各种实际斗争。他奋不顾身地奔走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组织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作为天津的学生代表，他两次进京，同北洋政府展开激烈的斗争。

1920年1月，反动当局为镇压学生的示威请愿，在天津制造了“一二九惨案”，50多人被武装的军警殴打致伤，周恩来等四名学生代表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冲进省公署交涉，但遭到逮捕，陷于囹圄之中。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高压，周恩来威武不屈，浩气凛然。他组织读书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和新思想，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读书会由各人分工宣讲介绍一、二种思潮和学说，周恩来负责介绍马克思主义。在狱中，他向难友们宣讲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生平等。周恩来不愧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之一。尽管身在牢笼，他和难友们

仍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常常心潮澎湃，不能平静。他在 5 月 4 日的日记中记载：

“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当然是各人脑中所不能免得。将来之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

1920 年 7 月 17 日，天津当局被迫宣布释放周恩来等全体被拘捕的代表。天津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往迎接，并颁发给他们“为国牺牲”的银质纪念章，以示对他们的光荣嘉奖。

在狱中的半年生活，是周恩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后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他还说过，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确实，他在这半年间，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自出狱之后，他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就在狱中的时候，国内掀起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也开始考虑甚有必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到欧洲去进一步寻求救国之路。准备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狱中向他辞行。周恩来作了一长诗相赠，表明了他的心迹。我们仅摘录诗中这样的两段：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练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起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心头一念。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四、“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变不了！”

周恩来出狱后，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果然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1920年12月中旬，到达法国马赛，第二年2月到布鲁瓦学习法文，同时做为天津的《益世报》的旅欧通讯员，定期撰写通讯报道寄回国内。他到欧洲后不久给他表兄陈式周的信中，谈到了为何赴欧的选择。他说，“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虚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周恩来最为关注的还是对主义的选择。出国之前在北京